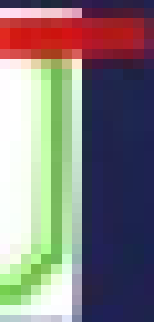


卢子震 著

理学基本理论概说

理学基本理念解説



理学基本理论概说

卢子震 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理学基本理论概说/卢子震著. - 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4.5
ISBN 7-5434-5664-8

I.理… II.卢… III.理学-研究 IV.B244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8981 号

理学基本理论概说

责任编辑 张福堂 蒋海燕

装帧设计 赵 磊

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hbep.com>

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,050061)

发 行 河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(石家庄市北二环西路 201 号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6.5

字 数 154 千字
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统 号 ISBN 7-5434-5664-8/B·35

定 价 9.70 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:徐春芳 陈志伟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。 0311—8641271,8641274

邮购地址:050061,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

邮购电话:0311—7731224 E-mail:wfbooksell@vip.163.com

序

宋明理学以崭新的理论思维形态，超越汉唐，开创了新学风、新思维，把中国学术思想提升到最高度。大凡哲学思想的创新，都与新时代、新需要相联系，同时亦与时代的文化政策相关联。它需要比较宽松的、自由的学术氛围。在文化专制主义、文化恐怖主义的政策下，即使经济再发展，也会“万马齐喑”。宋代在一定限度内营造了哲学思想发展的“春天”。宋初一扫唐中叶以后至五代的重武轻文的积弊，为重整伦理纲常，重构价值理想，安定社会秩序而提出“佑文”政策，或曰重文政策。宋太祖赵匡胤“晚好读书，尝读《二典》（按指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），叹曰‘尧、舜之罪四凶，止以投窜，何近代法网之密乎！’谓宰相曰：‘五代诸侯跋扈，有枉法杀人者，朝廷置而不问。人命至重，姑息藩镇，当若是耶？自今诸州决大辟，录案闻奏，付刑部复视之。’遂著为令。”^①不滥杀读书人，不搞文字狱。乾德改元，“乃大喜曰：‘作相须读书人’。

① 《本纪·太祖三》，《宋史》卷3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，第50页。另据《宋稗类钞》卷1载：宋太祖立誓碑，规定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。”

由是大重儒者。”^① 重儒文化政策的推行，不仅以文臣代替武将，而且建立了文官政治，学习尧、舜罪共工、驩兜、三苗、鲧“四凶”的投窜办法，不杀士大夫、儒臣、文官及上书者。这就使得士大夫、上书者在政治上敢于砭时弊，向皇帝进谏，提出改革政治主张；在学术思想上敢于冲决传统经学权威的网罗，发扬理论思维创新的主动性，提出种种创新的学术理论，推动了宋代学术的转生，从而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时代。

王夫之总结宋代学术兴盛的原因说：“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，终宋之世，文臣无殿刀之辟。张邦昌躬篡，而止于自裁；蔡京、贾似道陷国危亡，皆保首领于贬所。”^② 士大夫为了追求真理而“舍生取义”或“杀身成仁”都可在所不惜。然而，由于自己追求真理而累及九族，甚至亲朋、学生，这就比牺牲个人更可怕、更残酷，更恐怖；在心理上压力更大、更重、更深，于是使得士大夫不敢越雷池一步。“誓不杀士大夫”，这就给了士大夫学术思想的自由和文字的自由。有了人身生命的保障，就有了“天之贮空霄以翔鸢，渊之涵止水以游鱼”的空间。王夫之认为，这就是“宋之士大夫高过于汉唐者”的原因所在。故此，宋代士大夫们纷纷创办书院，建立学派，自由地发表言论，发挥各自思想智慧，以及发扬学术创新的“自作主宰”的自信性、自主性和自由性，互相探索论争，做到“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养转深沉”，而又能“珍

① 《本纪·太祖三》，《宋史》卷3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，第50页。另据《宋稗类钞》卷1载：宋太祖立誓碑，规定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。”

② 王夫之：《太祖》，《宋论》卷1，《船山全书》（第十一册），岳麓书社1992年版，第24-25页。

重友朋相切磋”。这是学术思想发展的正确途径，也是学术互相探讨、论争的尊严性。学术论争首先要尊重“他者”，即互相尊重论争对象；其次是互相平等，不是以自己的强势压迫对方，也不能以己方的学术地位、政治权势使对方屈服。黄宗羲在描述朱熹与陆九渊“鹅湖之会”的论争时说：“假令当日鹅湖之会，朱陆辩难之时，忽有苍头仆子历阶升堂，陆子而殴之曰：‘我以助朱子也’。将谓朱子喜乎？不喜乎？定知朱子必且挞而逐之矣。子之助朱子也，得无类是。”^①形象地说明了学术辩难的自由性和平等性。这样才能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，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，这才是华夏学术造极于两宋的重要原因。

假如两宋的学术思想论争，维持在良性的学术思想自由氛围之中，那么，中华学术思想的成就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“造极”。然而，中国的学术家、思想家，乃至哲学家，都是一身兼任，官学同位，没有纯粹的学术家、思想家及哲学家，他们既关注形而上之道的探讨，更关心形而下百姓日用。他们胸怀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的抱负，不仅为“继绝学”而提出各种学术主张，而且为“开太平”而提出种种政治主张，两者相辅相成，相依不离。他们自己也不做分别而混沌为一。这不仅制约了其学术探索的深入和学术创新的成就，而且往往易于把学术辩难引向政治论争，也易于把学派之争转换为党派之争，这就限制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创新。

这种宽松的、自由的文化氛围，到了明代就不复存在了，士大夫的言论受到限制，不仅砭时弊者要受到镇压，而且连作

① 《象山学案》《宋元学案》卷58，黄宗羲按语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1887—1888页。

为《四书》之一的《孟子》也遭到删节。明洪武三年（1370）朱元璋为加强皇权的权威和君主专制的统治，反对《孟子》书中的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等语，并罢孟子配享。刘三吾根据朱元璋意旨作《孟子节文》，删去八十五条，认为“臣视君如寇仇”是鼓励臣民犯上作乱；民贵君轻是“诸侯危社稷则变置”的主张。凡讲得失民心的地方均删。文官、儒者、士大夫在政治上、思想上都受到制约，于是有对李贽的残酷迫害，东林党人的惨遭杀戮等。他们都是因文字言论而定罪。清代更是文网恢恢，密而不漏。文字狱数量之大，株连之多，残杀之惨，都达登峰造极。士大夫和知识精英们为了自家、家族、亲朋、好友的身家性命，只得“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”，便把自己埋入文字、音韵、训诂的故纸堆，对政治敏感的问题噤若寒蝉，哪敢在理论思维上进行创新。有清一代，知识精英们只能以背诵孔孟程朱的教条而打发日子，因此，只有伟大的考据家、文学家，而没有伟大的哲学家，就如“文化大革命”一样，只有红学家，而没有哲学家。

宋代的文化政策、文化环境得天独厚，其思想创发性、创新性，直追先秦，甚至超越先秦，使中国的朱子学成为东亚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，代表当时东亚最先进的文化、哲学和思想，推动了东亚各国的文化思想的建设。

卢子震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的教学研究工作，对于宋明理学有了深切的体验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视角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他把理学基本理论概括为四个方面：即世界、人、学、治世。在论世界中，他提出天地（天）、万

物（物）、人三个基本要领，天是万物的根据，人是万物的中心，把世界问题通过天、物、人的关系，构成宋明理学家的宇宙逻辑结构，即万物一体，天人合一的结构。

张载说的“立心”、“立命”、“继绝学”、“开太平”，都是主体人之所为。若无人，一切都为子虚乌有。人之能量、作用是最大的；有人天地万物才具有价值和意义，因此，陆九渊说：“天地人之才等耳，人岂可轻，人字又岂可轻。”人不可轻，所以“天地之性人为贵”，人是最宝贵、最珍贵的。王守仁则天地万物与吾一体，凸显了人的主体精神，以及人的尊严、独立和价值。基于此，中国哲学的精神体现为一种人学的精神，故作者以“论人”为理学基本理论的核心，这个体认确是中其肯綮。

理学家论天、论人，其目标是要人学做圣贤，为学做圣贤提供资源。在理学家看来，学做圣贤只有人才具备条件，这与佛教“无情有性”论有异。因此“为学”的核心是如何学做圣贤，“为学之方”又与工夫论相融合。治学之道是围绕涵养与致知，致知与格物，知与行，下学与上达，已发与未发，天理与人欲等问题而展开。

理学家既废寝忘食地追求“天之上为何物”的形而上问题，又孜孜不倦地关切百姓日用的形而下的问题。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便是从内圣到外王之事。“论学”注重内圣之事，“论治世”注重外王之事。外王的治世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。如果说哲学家在提出问题，政治家在解决问题，经济学家在实践问题，历史学家在总结问题，文学家在描绘问题，那么，理学家往往是一身五任的，不仅统文史哲于一身，而且援政治、经济于文史哲之中。这是中

◆ 理学基本理论概说

国哲学、思想的生态环境，也是中国哲学、思想的特征，由此而形成的理学家的思想，不可避免地照射出中国特色。

卢子震教授对于理学基本理论的体认，是其以心灵与理学家对话的成果。这种体认虽不面面俱到，但呈现了理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话题，为读者掌握理学基本理论提供了一本简素的、理论的、易懂的好读本。在当前人们工作紧张的情境下，这样的中国哲学读本是很需要的。是为序。

张立文

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

2004年7月1日

目 录

第一章	引 论	(1)
一	“理学”简释	(1)
二	理学的目的	(5)
三	理学境界的内容构成	(9)
第二章	论世界	(19)
一	天地万物人	(19)
二	万物一体 天人合一	(26)
三	气理心	(35)
第三章	论 人	(45)
一	性：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	(47)
二	心	(50)
三	情	(54)
四	心性情的关系	(57)
五	天理 人欲	(60)
六	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	(64)
七	胡宏等诸家心性观	(70)
第四章	论 学	(77)
一	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	(78)
二	涵养论	(87)
三	致知论	(95)

⊕ 理学基本理论概说

四	知行论·····	(113)
第五章	论治世·····	(134)
一	世道盛衰·····	(136)
二	理想追求与现实思考·····	(140)
三	内圣外王 治心为本·····	(145)
四	教 育·····	(148)
第六章	理学理论的自身矛盾与理学的 历史演变和学派分化·····	(152)
一	理学学派划分问题·····	(152)
二	理学的历史发展阶段问题·····	(156)
三	理学理论自身的矛盾与学派分化、 历史演变的关联·····	(161)

第一章 引 论

一 “理学”简释

理学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显然有些大，不好回答。可是想了解理学的人，大约一开始总会这样提出问题。答者恐怕也只好先选一两点，略为解释，以作初答。

无论谈中国学术史或中国思想史，大约都会涉及这样几个概念：两汉经学，魏晋玄学，隋唐佛学，宋明理学。这几个概念是同一序列的，它们都是一个时代占主流地位的社会的思想形式或学术形式。其中既包括纯粹的研究，也包括相应的现实主张的推广宣传和实践的要求。

理学是宋明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学术形式，它也是儒家学术在宋明时期的表现形式。在近两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，学术思想的主流被儒、释、道三家所支配，理学从属于儒学范畴，这是理学家和现代研究者共同承认的。所以研究者们又把理学称为新儒学，以区别于宋代以前的儒学。

新儒学与旧儒学的区别是多方面的，其最主要的则表现在理论方面。理学以重义理称，这是人所共知的。理学之重义理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其一，从治学形式上说，理学一改

汉唐经学重师说，重考据训诂的作风，它把理论思维摆到了第一位，以理通为上，从理论的一贯性上重新思考确定儒家伦理之义。其二，理学把儒学的理论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，在儒学里面确立了“形上学”这样一个部分。其三，理学内容的主要部分，是理论。所以，历来研究理学的人，都把主要兴趣放在它的理论方面。

中国古代学术中的理论内容，与我们现代所谓的“哲学”是很相近的。事实上，现代中国学界也就把它叫做哲学了。所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，都是把中国古代学术中的理论内容拿出来，作为哲学史料进行阐述的。由于理论内容在理学中占了主导地位，所以，现代阐述理学的工作，大部分是由哲学家们来做的。然而，在需要辨明理学为何物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指出，理学并不完全等同于哲学。古希腊、古罗马、中世纪欧洲，都有“哲学”这样一个学科。而中国古代并没有称为哲学的一门学问。虽然中国古代各种学术中大都包含着某种一般理论的内容，这种内容与西方人称为哲学的那个学科的研究内容非常类似，但实际上，它与西方人所谓的哲学还是有很大区别。西方有明确的学科概念，这就说明西方人对哲学研究有一种自觉。研究者势必会自觉地运用学科概念来规范其研究活动。学科概念自然包括着对研究的性质、方式、内容的规定。相对于西方的哲学研究而言，中国古人所作的一般理论思考如果也叫做哲学研究的话，那么它也带有很强的自发性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理学不仅包含着人们称为哲学的一般性理论思考，它还包含着许多别的东西，如今人称为政治学、伦理学、历史学、自然科学以及古人称为“经学”的东西等。

虽然理学并不就等于哲学，但理学中所包含的“哲学”内容无疑是其最主要、最有价值、最能表现其特点的部分，所

以，现代研究者大都把兴趣集中在它的哲学方面，我们自然也不例外。

我们认为，理解一种理论的性质、特点、基本内容及其发展过程，有两个因素最为重要：一是人类思维自身由简单到复杂、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和该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结构；一是该理论的发生、存续、发展所处之时代的社会经济、政治、文化条件。

总的说来，人类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水平是不断提高和发展的，后一时代的理论思维比之前一时代总要更深刻些，更复杂些。具体到理学，宋代的理学家们，势必对以前的儒释道各家的理论思维有所研究，有所总结，有所吸纳，有所继承，有所突破，有所发展。佛学和道家，把思维引向抽象的事物，大大地发展了中国人的思辨思维，在理论思辨中，人们的综合与分析能力大大地提高了。但是，这种思辨，把人们导向虚无，因而，它只能适应少数人的兴趣，而不能满足多数人指导现实生活的需要。宋以前的儒学，则把思维指向现实生活经验及指导现实生活的规范，包括前人的经验与规范和本时代的经验与规范。它大大地丰富了思维的具体内容，并始终保持了思维的现实价值取向。然而思辨理论的发展，启发了人的理性自觉，传承家法越来越不足以维护人们对规范的合法性的确信。理论思维的发展还不断刺激着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，在不断觉醒的个人主体意识面前，如若没有对普遍原则和普遍理论与特殊规范关系的思辨的思考，则灵活适用规范、变革旧规范、给出新规范，这些不能不经常做的事情便都成了缺乏依据的。宋人正是有鉴于此，乃将佛道的思辨理论成果加以扬弃，使之成为较一般化的理论思维形式，用于儒学研究，以弥补先前儒学之不足。这样，使中国人的思辨思维，不仅具有超越性，而且具有

现实性，不仅可以把具体事物抽象化，而且可以把抽象原则具体化。小则条分缕析，辨析毫末，大则万理归一，化为一体。理学家的思维使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进了一大步，使中国人的分析水平和综合能力进了一大步。

一种理论，必是有一基本的逻辑结构，由若干基本理论概念构成的逻辑结构。这种逻辑直接制约着理论具体内容的增益、展开和理论内容的历史发展。理学中，天、人、万物、心、性、理、形质、欲望、形上、形下、理与气、道与器、知与行等，便是一些基本概念，对这些概念的规定和对相关概念间关系的规定，便构成了理学的基本逻辑。理学的派别分化、演进和各派理论的内容，便不能不受这基本逻辑的制约。

理论的社会历史条件，也可从两个方面看：一方面是说，一定的现实生活，自然会在人的思想中产生一定的反映，形成一些理论观点。这些理论观点的形成方式是自发的、消极的、未经选择的；另一方面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，人们必会产生对知识、文化、理论和精神的需要，以便指导生活，交流思想，激励精神，排遣哀愁，愉悦心情，消磨时光。因而必定有人出来选择、提升、整合那些自发产生的理论观点，使之能够满足一定的人群乃至整个社会的需要。在普通精神文化需要上面，还有国家的政治需要。既能满足人们的知识、文化、理论和精神需要，又能满足国家政治需要的理论，便能成为国家容忍、欢迎、支持的社会意识形态，甚至成为直接的官方意识形态。理学也经历了自发萌生、自觉整合，争取社会认同和官方接受的过程。因此，对理学的本质，也必须从它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上加以理解。

理学的理论，与西方哲学之理论，非常类似，所以我们才称之为哲学。但实际上，理学理论与西方哲学之理论还是有

大区别的。比如，在内容上，心性涵养学说乃是理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，而在西方，它无论如何也不能构成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再比如，在把握概念的方式上，直觉体验是理学的重要方式，理学的许多重要概念，其意义和内容，不仅是由思维逻辑规定的，它们还意味着相应的感觉状态和感情、意志状态。如天人合一、万物一体、道、理、心、性等，都不是纯粹的逻辑概念。按照理学，对这些概念，不仅要掌握其逻辑运用，而且要能体验到相应的情境，有相应的行动意愿，这才算有所了解。理学这种理性思维与感觉混而为一，知情意混而为一的认知方式，对西方哲学来说是根本不能接受的。

上述各点，是了解理学概念时应当首先掌握的内容与方法。

二 理学的目的

冯友兰在其所著《中国哲学简史》中说，哲学的目的在于“提高心灵的境界”。这个说法若用于中国哲学，用于理学，再恰当不过了。理学要把心灵的境界提高到怎样的程度呢？圣贤。圣人是理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，贤人次之。周敦颐所谓“贤希圣，士希贤”。冯友兰说：“佛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佛。……新儒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为儒家的圣人。”这话应当认为是很确当的。事实上许多理学家都直接谈到过对理学的这种认识。例如王守仁，与朋友实践朱熹格物之说，在庭前格竹子，或三日，或七日，皆不能得其理，且劳思致疾，于是相与叹道：“圣贤是做不得的，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。”后来龙场悟道后则说，决以为圣贤可学而至。这说明，理学即是